

陈学明 黄力之 吴新文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探索和奋斗的结晶，具有其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是有自己的底线的，底线之一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指导思想地位不容放弃。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线

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不仅表现在领导者的筹划和决策之中，而且也表现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是有自己的底线的，而且它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并加以明确的。如果忽视了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底线，就会动摇“党基”和“国本”，就会陷入“为探索而探索，为改革而改革”的怪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就会被人指责为“徒有其名”，“挂羊头，卖狗肉”。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中，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一直注意澄清社会主义的原则或底线的。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曾经明言：“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

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这一底线的强调实际上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大原则。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当时判断人民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是：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在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邓小平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中除了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的三项原则。中国社会主义的底线，是由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确立的，而以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不断地完善对这种底线的阐述。概括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线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容动摇，西方式的多党制不能引进。一个团结的、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现代文明国家保持稳定和繁荣的关键，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是中国现在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是中国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能加强和改善，而不能动摇和放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必然重新陷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唯

一指导思想地位不容放弃，不能认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中国共产党必须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和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如果放弃这一地位，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等量齐观，就会造成人民的思想混乱，最终使共产党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自乱阵脚，自毁前程。

第三，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国家制度不容改变，绝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做到以人为本，对人民实行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分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各项权利，保证人民对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质性参与，同时又要避免西方形式化民主的弊端。另一方面，在国外敌对势力分化、瓦解中国的图谋仍然存在，在国内分裂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敌对分子、严重腐败分子、邪教分子和极端反社会分子的破坏活动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必须继续坚持对上述敌人采取专政的方针，严厉打击他们的违法破坏活动，取缔他们的非法组织和出版物。对敌对势力的任何软弱退让将导致局势失控，最终出现“亲者痛，仇者快”的混乱和动荡局面。

第四，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容退让，绝不能容忍分裂国家、制造民族隔阂和对立、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没有国家的统一，其他一切都谈不上。要以和谐社会、人民共和的理念遏制和消解以民族自决为名行民族分裂之实的逆流。人民共和的要义是“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与边疆少数民族自治的统一，是“和而不同”，是差

异中有和谐，是一体多元，共存共荣。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要坚持发展经济和打击民族分裂势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如果只是陷入经济主义，只讲利益原则，而默许民族分裂势力坐大，将铸成大错，“国将不国”。

第五，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按劳分配为主，各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容破坏，绝不能实施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切实保障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党和政府必须保持对金融、重要自然资源以及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的控制，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必须占主导地位。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建立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之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一旦引入中国，将破坏中国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并使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

第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发展方针不容歪曲，绝不能纵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丑化、简单化以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诋毁。在文化建设上以当代中国为主体，建构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国家和文化认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同时也反对复古主义和全盘儒化论。

第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容替代，绝不能与任何国家结盟或参加排外性的国家集团。在国际交往中增强自信，培养文明大国意识，坚决捍卫国家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涉及国家尊严和核心

利益的南海、钓鱼岛问题上绝不退让半步，体现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对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要坚决抵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抱幻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上述七条底线，是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实践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体上也遵循了这些底线。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思潮激荡，各种政见歧出。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底线的公然挑战，是祸国殃民的聒噪。党和政府在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绝不能含糊其词，虚与委蛇。明确了上述底线，绝不意味着不会有人来触碰它们。事实上，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企图逾越这些底线的人总是有的。关键之处在于，当他们这样做时，党和政府要有鲜明的立场和态度，积极作出有效的应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基础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

义。”胡锦涛还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根据这些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既没有丢掉马克思、毛泽东等思想家，而且还发展了他们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胡锦涛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时，提到的第一个结合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强调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在于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发挥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他进一步要求全党“要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条件结合起来，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决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这条“新路”实际上也就是一条“中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路。

习近平在阐释和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不断

发展进步，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既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既继承了前人，又创新了内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的灵魂

不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明确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国外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夫妇发现：“它（中国——引者注）从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但是很快就根据自己的思想和现实需要对这些学说进行了调整。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但是政治立场没有动摇。”“经历了思想解放进程的中国就像一个‘混血儿’，也许这个孩子很快会在吸取父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处之后，独立走出一条新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立场”，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已经是调整、“混血”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了。

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提出了一个问题：“胡锦涛为何说科学发展观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对此问题的回答是：“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它的方法论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历史条件，因此是‘科学的’；其二，它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实现共产主义，一个生活富足、没有阶级

甚或没有国家的社会。”在库恩看来，胡锦涛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指出：“中国现政府没有意识形态的怪思想。中国在集权制度国家中是个突出的例外。我们不想说中国人今天已经没有意识形态，我指的是中国人所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没有怪思想。”也许施密特相信，中国人仍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却是一种中正平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没有走极端。

平心而论，只要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从实际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取向、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体系，不是哪个领导人拍脑袋的结果，而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在三十多年中国现实的历史运动中提炼、总结和升华出来的。这一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高远的理想，又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大地。相信这棵理论之树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精心浇灌与呵护，必将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本文系《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选载之十）